

跛足巨人

[美] 威廉·富布赖特 著



跛 足 巨 人

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国内影响

〔美〕威廉·富布赖特著

伍 协 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CRIPPLED GIA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Domestic Consequences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72

根据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跛 足 巨 人

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国内影响

〔美〕威廉·富布赖特著

伍 协 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77,000

1976 年 1 月第 1 版 197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71·249 定价: 0.55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是前美国阿肯色州参议员，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立大学校长等职。富布赖特是民主党人，政治态度属于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所谓“鸽派”和民主党“自由派”代表人物，被国内“强硬派”称为“新孤立主义派”，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较大影响。作者在本书中主张对外缩短战线，从东南亚迅速撤兵，减少驻西欧和其他地区的美国部队，大力削减对外军援承诺，“把重点从对外转向国内”，集中力量解决国内危机；同时主张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利用联合国作为争霸工具，以遏制苏联，镇压民族革命运动。作者赞同“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又念念不忘要“遏制中国力量”；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又怕我“使用否决权”。

作者以美国政府中决策人员的立场观点，反映和暴露了美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奉行战争侵略政策的破产及其严重后果。他哀叹，由于“盲目奉行反共的

杜鲁门主义”，美国已沦为“物质上衰退”，“财政上匮乏”，“精神上枯竭”的“破败社会类型”，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已变成了颅裂肢断的“跛足巨人”。

书中对美帝的侵略成性及其妄图独霸世界的野心，作了一定的刻划。作者承认，“世界宪兵的精神已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存在着”，国内的军界和工业界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形成了一股使军事卷入永久化的强大力量”。作者并承认，这一政策涉及美国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苏美两霸“进行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就使得美帝“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军火商”，和打起“保卫自由”的幌子、同苏修争夺霸权、进行世界性侵略扩张的“国际警察”。

帝国主义愈走向没落崩溃，对国内的反动统治就愈加法西斯化。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争吵中，作者作为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亲身看到自己手中的国会外交大权“落到了总统一人手中”。他揭开了美帝一向标榜的“民主”遮羞布，不得不承认作为垄断资产阶级工具的美国政府，已走上了“皇帝般的”“总统独裁制”；参众两院“已沦为徒有其名的民主装饰”；美国人民已对美国政府“深深感到幻灭”，感到“战争和社会的不公道都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这说明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已经激化，美国人民正在觉醒中。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中国、朝鲜、越

南三次侵略战争中的失败及其惨痛教训，作者进行了概括的论述。他认为美帝“介入中国内战，结果是可悲的”；承认侵略中国、朝鲜、越南都是“师出无名”，是“荒唐可笑而失算的战争”，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战争”；哀叹三次侵略战争使美国“耗尽了资源和精神力量”，惊呼“由于野心过大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枯竭，国家已被削弱，想要从根本上恢复力量，为时已晚”。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中发出的这种哀鸣，深刻地反映了美帝正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穷途末路。

作者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衰落，但他又幻想资本主义“能够自行更新”。作者自诩属于“威尔逊、罗斯福式”的“正统的国际派”。他替垂死的资本主义开的药方是，“通过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来“维持和平”；叫喊要“组织世界警察力量”，组织“联合国警察部队”、“国际维持和平部队”来“干涉”民族解放斗争，镇压“无限制的民族主义破坏”；叫嚣由联合国“以一项和平解决办法‘强加’给中东，‘强加’给东南亚”，“将是好事”，“以大国地位调解解决”，是“公平而持久的解决办法”。一副挂着“国际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的狰狞面目跃然纸上。

利用联合国来贯彻其战争侵略政策，是美帝多年来的伎俩，也是作者的一贯主张。在第三世界反帝、反

殖、反霸斗争的冲击下，尤其在二十六届联大我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联合国作为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表决机器和苏美争霸工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富布赖特不得不承认，1971年10月，二十六届联大关于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和驱逐台湾蒋帮表决案的胜利通过，是“一次赞成或者反对美国的世界性公民投票”，表决结果“有惩罚美国的味道”。他并且透露，对于第三世界取得的胜利，美国统治集团感到“震惊”，前总统尼克松对之“表示激烈的愤怒”，前副总统阿格纽气急败坏地咒骂联合国已变成了“左派大造舆论的机构”。书中大量的反面资料证实了当前世界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好革命形势。本书比较深刻地暴露了美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侵略政策的失败及其国势急剧衰落的原因，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重矛盾与深重的困境。由于富布赖特本人原属于美国国会中的上层代表人物，他的观点较能反映美国统治集团的内部争吵和权力斗争以及美国对外政策发展演变的某些侧面。因此，本书对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后果，是可供作参考的反面资料。书中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对外政策的恶意攻击之处，阅读时请注意加以批判。

1975年9月

目 录

引论——政策概念.....	1
第一编 美国的对外政策	
第一章 杜鲁门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各地.....	15
一、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17
二、赫鲁晓夫插曲	23
三、冷战在欧洲的遗迹	31
第二章 杜鲁门主义在亚洲.....	45
一、中国的沦亡	45
二、战时的中国	50
三、胡的越南	56
第三章 越南——一场徒劳无益的十字军战争.....	68
一、胜利的幻影	71
二、越南(战争)的是非曲直	79
三、这场战争中的地理政治论	86
四、结束这场战争	97
第四章 中东——神话和现实.....	103
一、神话	106
二、前景展望	113
三、走向和平	137
第五章 比赛的规则.....	146

一、我们的“重大利益”	148
二、回到首要原则	152
三、越南战争之后	156

第二编 国内的影响

第六章 国会与战争	173
-----------------	-----

一、总统的战争	177
二、不起作用的国会	187

第七章 美国立宪民主政体的衰落(与崩溃可能)...	197
---------------------------	-----

一、危机的法律学	198
二、宣战权	202
三、缔约权	209
四、帝国的总统	219
五、对待的办法	226

第八章 社会状况	234
----------------	-----

一、金钱和优先次序	235
二、令人焦虑的社会	245

第九章 结论：帝国的代价	255
--------------------	-----

一、竞争性的冲动	258
二、“空洞的权力体制”	264

引论——政策概念

我不认为人类目前有打核大战而自取毁灭的迫切危险。当然,也不是说,这已不成问题了——意外事件总是可能有的。而且短期内我们得以生存,也不是长期内可以高枕无忧的依据。尽管如此,由于七十年代初期热战和冷战的减弱,世界上似乎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力量均势。各大国认识到各自核武库的遏制威力,已从核战争的边缘后退,使世界可望得到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的喘息时间。这是值得聊以自慰的。现在看来在本世纪内人类如果被毁灭或遭受大量死亡,可能不是由于核战争,而是由于人口的过剩或者环境的污染。

我在1966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过去最大的保守派,诸如伯克、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如果在今天还活着,他们也不会是反共的忠实信徒或是无情的反共的十字军战士了。他们会愿意同现实世界实行妥协……”^①虽然还存在着重大的异议与意见分歧,这已成为保守的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总的趋向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从意识形态的十字军运动朝着传统的强权政治的转变(就已经发生的转变而言),竟然是在不久前还是一个十字军运动急先锋的总统领

① 《自恃过高》(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66年),225页。

导之下进行的。不过，尼克松先生的无懈可击的反共凭证，却无疑是促使这一转变的有利条件，尼克松政府还有某些政策仍然原封未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继续进行越南战争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尼克松-基辛格政策显著地表现出同以往的反共意识形态是背离的，而这种意识形态曾经十分强烈地影响到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由三个基本概念构成的：国际安全集体的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还有把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力量争夺的传统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和信仰重新复活，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世界体系，它代表的“不是力量的均势而是力量的集合；不是有组织的相互争夺而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①在1945年满怀希望的日子里，拟定了联合国宪章——“要使后代免受战争的祸害”。尽管当时认为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已经十分庞大，美国参议院仅仅经过几天的辩论便以八十九票对二票予以同意。冷战一开始，包含在联合国宪章中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由于象迪安·艾奇逊（当时担任副国务卿，后来是国务卿）这伙因袭陈规的外交家的出谋献策，杜鲁门政府在同苏联展开战后斗争中，已回复到或试图回复到强权政治的老路。结果，宪章就被忘掉了，直到今天，既说不上成功，也谈不上失败，它不过是为古老的国际政治“比赛”增添了一套未经试用过的新规则而已。

① 威尔逊总统 1917 年 1 月 22 日在参议院的演说。

面对国会中和国内新的孤立主义情绪，杜鲁门政府在抵制斯大林对欧洲的压力问题上，认为有必要（同时也许正符合自己的心意）使用笼统的意识形态语言而不用准确的策略语言来表达政见。在1947年2月27日白宫的一次决策性会议上，与会的国会领导人发现乔治·马歇尔国务卿所如实地阐明的拟议中的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计划，是“相当无聊”和“有害的”。为此，艾奇逊副国务卿要求发言，竟把共产主义的威胁说成是一种讨厌而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瘟疫，这个比喻不久便为人所熟知。艾奇逊后来写道：“我从来讲话没有过象那次感到事关大局责无旁贷的迫切心情。”当时他说，苏联向希腊和土耳其施加压力“可能为苏联打开向三大洲渗透的道路。好象一只烂苹果毁了一桶苹果那样，希腊一烂掉就会感染到伊朗和整个东方。它又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传染到非洲，并通过法国和意大利传染到欧洲”。据各方面报道，与会者都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在艾奇逊发言之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参议员打破了“老谋深算的沉默”，向杜鲁门总统表示：“如果你向国会和全国上下这样讲，我一定支持你，我并且相信大多数国会的成员也一定会同样支持你。”^①

杜鲁门主义以概括的意识形态语言作为它的内容，并不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发动反共十字军运动的“原因”或真正

^① 理查德·M·弗里兰：《杜鲁门主义与麦卡锡主义的缘起》（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普出版社，1972年），96—97页；约瑟夫·M·琼斯：《十五周》（纽约，威金出版社，1955年），138—143页；迪安·G·艾奇逊：《创始时在场》（纽约，W·W·诺顿公司，1969年），219页。

的实质所在。他们在战略上使用类似宗教名词也许至多不过是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对付国内政治的一种战术。然而，它却具有象征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从此以后，美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行动、政策与声明所作的反应，不再以它们各别的变化中的政治和战略上的长短曲直作为依据，而是象范登堡参议员所说的，着眼于“东方共产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冲突……”^①

政治家的这些说法，基于他们的言词本身的力量，不久他们自己似乎也信以为真并接受下来了。我们不妨说，从杜鲁门主义时期一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美国政治家对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一直是着眼于笼统的意识形态方面，而不是着眼于对我们的利益方面有什么特定的威胁。肯尼迪总统就职时发出的豪言壮语还在我们耳边回响，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被赋给了在最严重的危险时刻担负起捍卫自由的重任”。现在回顾起来，实在很难确切地回想起在1961年那个平静的冬天有什么“最严重的危险”。最近一段时期，尽管重点已从意识形态战争转到了传统的强权政治，尼克松总统仍然一再重复迪安·艾奇逊的关于瘟疫的比喻。他警告人们：美国从越南的撤退（他喜欢用的字眼，是我们的“耻辱和失败”），“将会在我们承担着协助维持和平义务的任何地方——在中东、在柏林，最终甚至在西半球，触发暴力的火花”。^②

① 小阿瑟·H·范登堡编：《范登堡参议员私人文件》（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2年），340页。

② 1969年11月3日的演说。

由于这方面有一位学者的出谋献策，尼克松已成为一个执行传统的强权政治的老手。他的政策同时反映出这个古老艺术的优缺点。用地理政治论的方法观察问题，从威胁以及利害得失出发进行仔细和冷静的分析，是对意识形态的十字军运动的一项巨大的改进，而且看来正在一步一步地取而代之。从它本身前提来看，它的优点是它的一贯性和合理性。它的缺点是，这些前提具有冷酷和非道德的世界观：重手段，轻目的；重强权，轻人民。在这些前提下，“比赛”只不过是一场竞技，是为了竞技而进行的，不是为了要赢得某些东西，而仅仅是为了打赢而已。在传统的力量均势准则的支配下，均势的“推行者”必须对争议中的较弱一方给以援助，而不问争端的是非曲直。这些规则可能使推行均势的大国站在确实遭受侵略的一方，例如 1950 年的南朝鲜；但是也可能使“推行者”站到对本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政权方面，例如 1971 年美国支持西巴基斯坦反对孟加拉国的孟加拉人及其盟友印度。取舍的标准既是无意识，又有政治性；它并不完全排除人道与正义上的考虑，但这些是属于次要性质的。最后，在均势政治的一切缺点中，最重要的是：不管它能在一定时期内把和平维持得多么成功，它最后总是要垮台，象 1914 年世界大战终于爆发那样。除了不道德和缺乏实质性目的之外，地理政治论的观察方法本来就不是稳定的；尽管巧妙地加以运用，它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推迟战争，但是到头来它还是要走向战争。

从地理政治论的“定律”来看，力量均势和“推行者”这个角色都是无法随意选择的。在 1971 年初一次重要的接见记者访问时，尼克松总统表示过他深信：“在今后的二十五年内，美

国注定要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成为在经济与核力量方面的巨人。我们不能不是这样。我们不能逃避我们的责任。”^①这个观点正好阐明了马库塞教授所描述的那种“既成事实上的极权独裁”。所没有看到的实际可能性是，事情似乎是这样，并不是由于必然是出自偶然。^②总统说我们“不得不”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好象这件事显然不是人力所能选择的，而是上天的力量所决定的。有了这种信念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甚至不能想象有任何别的可能性。由于我们再也没有想到所有其他可能性，我们就不得不象过去那样行事，自取灾难和失败。“现实主义”变成了对被证实为灾难性的行为模式的盲目重复。其他的一切都是“不现实的”——并不是由于真的不现实，而是由于有一个支离破碎而又阴森恐怖的所谓“现实”的概念束缚着我们的思想。

基于长期的经验，国际政治的概念被看作是无休止的、无意识的和无目的的权力斗争，这并不是虚妄的或者是无中生有的。它毕竟是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正常行为的相当准确的说明。若干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自称为“大国”，不以一般国家或社会集团自居；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国际政治的性质。在某些人的“显要的地位”，或者在更为流行的“大国的责任”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说的背后，存在着再也明显不

① C·L·苏兹贝格：《尼克松在谈话中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战争》，《纽约时报》，1971年3月10日，1页、14页。

② 赫伯特·马库塞：《技术社会中的社会变化问题》，见《社会发展》，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讨论会（巴黎，莫顿公司，1965年），153页。

过的假设：各国进行国际活动就是为了攫取权力，而你得到的权力越多，你运用权力的责任或使命也就越大。有了权力决不能弃置不用。如果你能够恃强凌弱，那么，你一定害怕被人看成是一个“可怜而无用的巨人”。

这个概念的错误，不在于它曲解了人类的经验，更主要的是它已经过于陈腐，完全没有顾到人类的正当需要。在强权政治游戏中，甚至最辉煌的成就也无法使任何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或更为幸福，只有一小撮战略家和地理政治论者，他们以整个社会作为卒子玩弄于棋盘之上，才会感到兴致勃勃。普通的公民对此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他们的孩子们被送去从事无益的战争，他们赚来的钱没有被用到他们真正需要的地方（诸如学校、住宅和社会福利事业）。而且，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美国飞行员或战俘，或者是一个越南农民，那么，所谓“大国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你生活得幸福或有乐趣——即使你能够幸存的话。

尼克松总统在《六次危机》一书中讲到，他在青年时对投身于“政治的战争”^①感到踌躇。看来把政治当作战争这种看法，不仅是尼克松政府的观点；就国际关系而言，这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观点。根据先验论的假设，世界的局势天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就是一种根本对抗的局面。我们从并非典型性的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恐怖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假设，直到用地理政治进行考察才有了改变。这些假设

^① 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纽约，道布尔戴公司，1968年），317页。

是：中国决心要征服亚洲并使它共产主义化；俄国人的不可动摇的野心是要吞并西欧和消灭美国；唯一足以制止共产主义国家推行其罪恶计划的办法是美国的军事威慑力量。我并不是说对俄国和中国的野心的这个估计不对，我只是说它不一定就对。正如马克·吐温也许会这样说：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能获得的启示，可能比实际存在的要多。我自己相信，俄国和中国的行为受到怀疑我们的意图的影响，正如我们的行为受到我们对它们的意图的怀疑的影响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它们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意味着如果把它们当敌人对待，它们就当然要与我为敌。如果政治真是战争的话，那并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是由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自己所造成的。

在前文提到过的那次接见记者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对于他所目睹的“以前的国际派”向“新孤立主义者”的转变表示惊愕不解。这就提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国际派的问题。确实，在我们这些支持过联合国宪章、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组织条约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人对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和双边的对外援助采取了批评态度。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国际派。我认为我们应当遵守一切正式缔结的条约，既要履行条约规定的军事支援义务，例如对北约组织，也要履行不干涉内政的义务，就象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所规定的那样。我尤其认为，即使迟至今日，我们也应当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做）把联合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安全组织。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本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伟大的思想，